

政治與宗教的競合：後蘇時期烏茲別克伊斯蘭為例 之探討

趙竹成*

摘要

伊斯蘭在中亞地區有悠久的傳統，形塑了中亞地區文化和人民生活模式。經歷了蘇聯時期的去宗教化和世俗化後，並隨著蘇聯瓦解和民族國家的建立，伊斯蘭在中亞地區經歷了不同的轉變過程。首先，中亞地區民族國家建立的同時，由共黨專政轉換的新興政權利用伊斯蘭來凝聚國家共識，並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然而，隨著境外伊斯蘭運動思潮的進入以及伊斯蘭影響力的加大，造成世俗政府與伊斯蘭份子之間的緊張對抗關係。而在全球反恐趨勢下，反伊斯蘭極端主義遂成為中亞和全球反恐的焦點。

關鍵詞：中亞、伊斯蘭、蘇聯、極端主義、烏茲別克

*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e Case of Uzbekistan Islam during the Post-Soviet Period

Zhao, Zhu-cheng*

Abstract

Islam has long-standing traditions in Central Asia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regional cultures and ways of living. Through the course of secularization in the Soviet perio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Islam has undergone various transformations in Uzbekistan. At first, while the nation-state was establishing itself, the new regime succeeding the Communist dictatorship made use of Islam to forg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o fill up the ideological vacuum, but following the incursion of Islamic movements and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Islamists, conflicts arose between the secular government and Islamists. As global anti-terrorist movements increased, anti-Islamic extremism became the focus of Central Asian and global anti-terrorist activities.

Keywords: Central Asia, Islam, Soviet Union, Extremism, Uzbekista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壹、前言

政治與宗教之間的競合關係一直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也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與思想範式的國家在確立政治與宗教二元結構體系的規範過程中的重要途徑。然而過往對這類的課題研究，偏向以基督宗教作論述，較少以伊斯蘭為主要對象。混合著無神論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體制的蘇聯瓦解之後，提供了一個觀察政治變遷進程中，伊斯蘭角色變動性的可能場域。

眾所周知，中亞地區主要信仰為包括順尼¹及什葉兩大系統的伊斯蘭，伊斯蘭在此區域的悠久傳統，形塑出中亞地區文化和人民生活的風貌。由俄羅斯帝國時代開始的征服中亞地區被納入一個帶有濃厚基督宗教精神帝國管理系統，再經歷蘇聯社會主義無神論意識形態的洗禮，經過去宗教化和世俗化運動後，隨著蘇聯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建立，伊斯蘭在中亞地區經歷著不同的轉變過程。首先，中亞地區民族國家建立的同時，由共黨專政轉換的新興政權，利用伊斯蘭來凝聚國家共識，並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然而，隨著境外伊斯蘭運動的進入以及伊斯蘭影響力的遽增，造成世俗政府與伊斯蘭主義群體之間的對抗關係。最後，在 911 事件之後，伊斯蘭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被畫上等號，成為國際反恐的焦點。中亞在這種全球反恐趨勢下，不僅面臨著內部政治與宗教的競爭，同時也牽動著文明衝突與區域安全等課題。

烏茲別克是當代中亞地區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歷史上，西元十一世紀時位於今日烏茲別克的花刺子模 (Khwarizm) 即是重要的伊斯蘭文化中心，布哈拉 (Bukhara)，撒馬爾干 (Samarqand) 等地自古以來即是中亞伊斯蘭歷史上重要的文化、教育、商貿中心。烏茲別克所代表的綠洲文明，在伊斯蘭文化的實踐上又比哈薩克，吉爾吉斯等以游牧文化為傳統的穆斯林國家有更重要的典範意義。因此本文中以一節專論烏茲別克的案例。

¹ [編按]伊斯蘭的教派通常分成 Sunni 與 Shi'i 兩派；而一般錯誤地將 Sunni 音譯成中文「遜尼」，此音譯並不符合阿拉伯文原音，亦即「遜尼」若還原到阿拉伯文則是 Shūnni (阿拉伯文中並無 ü 的音)，這並非原來的字سني。因此正確的中文音譯應該是「順尼」。

由後蘇時期伊斯蘭在中亞的議題為緣起，本文嘗試就以下課題的梳理，對伊斯蘭在中亞政治變遷中角色的變化作述論：宗教在俗世政制發展進程中面臨的議題、中亞伊斯蘭的蘇聯遺緒、烏茲別克的案例、宗教極端化的變因、政治與伊斯蘭互動角色的階段性變動。

貳、宗教在俗世政制發展中面臨的課題

如果把宗教視為文化整體結構的一部分，則宗教本身必須考慮下列三個變化的可能性：宗教的自變性、傳統社會結構（在中亞特別要考慮氏族政治的深層影響）以及國家政治及經濟轉型下的作用。

變遷作為一種自然規律，無論由進化論 (evolutionary theory)、新進化論 (neo-evolutionary theory)²、衝突論 (conflict theory)³、功能論 (function theory)⁴ 或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⁵ 等各種解釋模式去觀察，都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因此，將宗教生活及其形式固化在某種特定空間的社會靜態學 (social static) 或是特定時間的共時性 (synchronicity) 範疇中去理解，如果又忽略社會動態 (social dynamics) 的歷時性 (diachronic) 特質，則會出現理解上的矛盾。而宗教組織又是社會整體結構的一部分，宗教無法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單位。因此，關於宗教的

² 進化論認為社會的變遷是一種單線，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而且這種過程是一個普遍性原則。新進化論則認為社會的變遷是依照各自地區不同的環境而形成，是一個多樣性模式。關於進化論類型的闡釋，請參考：Alan Barnard, *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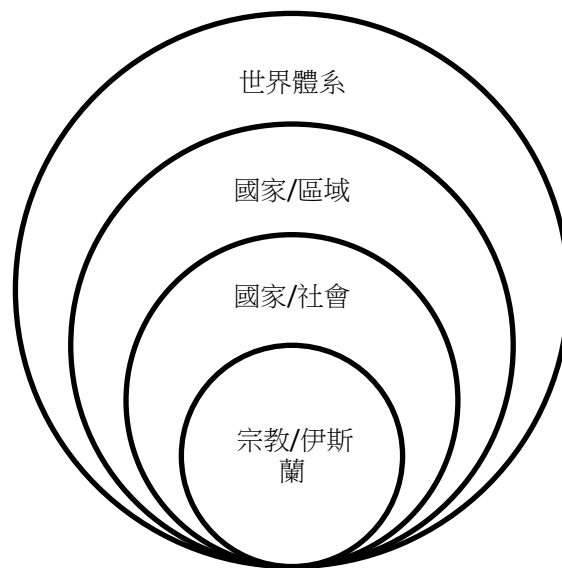
³ 衝突論 (conflict theory) 不同於功能論強調文化各種元素中的合作性而是強調其彼此之間出現的競爭性，這種競爭性所引發的變遷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Jeffrey C. Alexander, "lect. 8. Conflict theory (1) John Rex's strategy," "lect. 9. Conflict theory (2) Rex and the problem of coercion,"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7-155.

⁴ 認為文化是一個整體，由各種元素所具有的功能整合而成。而文化現象皆有其意義和功能。關於功能論的說明，請參考：Alan Barnard, *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pp. 61-79.

⁵ 係指傳統社會的發展會循著西方先進社會的軌跡前進，特別是工業化扮演著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現代化對傳統的否定在伊斯蘭研究中卻有不同的結論。Ali Banuazizi 在考察 1970 年代以後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過程中發現，傳統並未因現代化進程而解體，反而可以成為動員的基礎。Ali Banuazizi, "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Huntington,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p. 281-316.

討論又必須放在整體社會結構中處理。就中亞的傳統社會特性來觀察，氏族政治一直對世俗的社會、政治結構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但是，國家作為人類社會型態的最終模式，到目前為止，社會及文化活動仍然不能脫離國家運作過程中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力。事實上，就政治史的發展來看，政治與宗教之間因為權力競逐所造成的民權與神權之間的相互主客體位置的轉換，是形塑當代社會型態及意識價值的一個重要的背景。

隨著全球化變遷腳步的加快，單一國家無論是自願或是被強迫，都無可避免地被納入世界體系的全球框架中，而形成一種差異化的格局。這種格局無法以一個平面的圖像去理解，而要透過一種層次性架構去檢視。換言之，宗教不能單就宗教本體自身來觀察，還必須考慮其他客觀性的影響因素。簡言之，要視其為世界體系格局的一環。如（圖 1）所示：



【圖 1】世界體系格局→文明的競爭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由前述的角度出發，有一個假設性的命題是探討本主題的重要概念：中亞伊斯蘭就實質上，並非中亞的伊斯蘭，而是世界格局架構下的伊斯蘭。因此，如果中亞

伊斯蘭作為這種格局依據變項的一部分，伊斯蘭則無法孤立或是迴避在其自我發展過程中會面臨其他宗教曾經面對過的議題：現代化、本土化及去政治化。宗教的現代化 (modernization) 事實上就是宗教在其變遷過程必須面對與科學、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兩者的對話。科學意謂著系統性知識論的調整，個人主義則意謂單獨的信仰者個體在宗教集體中有著更多自主性的權利與自由。就本土化 (localization) 而言，如同借用生物學上的適應性 (adaptation) 概念，當今的普世型世界宗教都必須透過本土化的適應過程，才能一方面將其向外擴散過程中與異文化之間出現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 轉換成與本地相互適應調整的同質性 (homogeneity)，並且能夠以最大程度保持宗教基本的核心內涵。這裡面即形成宗教組織的運作與意識型態的話語權，是由在地政府掌握而成為國家社會結構中的一部分，或是成為境外分支的競合問題。去政治化 (depoliticization) 與政治化是一個相互依存的現象，與世俗主義 (secularism) 的概念息息相關，因為去政治化與世俗化代表著政治與宗教兩者之間在權力場域上的競逐，而世俗主義更意謂宗教在公共領域的全面退出，轉移到私領域層面。以現代政治運作的普遍性原則來看，雖然政治與宗教的分離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被視為現代政治社會運作的法則，但是這個原則遇到伊斯蘭法傳統時，仍舊會出現在政治權力競逐中，世俗化與傳統性兩者之間的競逐。以下將由蘇聯時期的宗教去政治化和世俗化為起點，來觀察伊斯蘭在中亞地區的變動。

參、中亞伊斯蘭中的蘇聯遺緒

由前述的現代化、本土化與去政治化的脈絡延伸，可以理解到後蘇時期中亞伊斯蘭的發展不是特定時空突然出現的結果，而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因此，在討論當代中亞伊斯蘭的現象時，我們必需回溯中亞各國在蘇聯時期的變動歷程。若回到後蘇時期的整體時間和空間脈絡，則會發現有下列因素構成一個影響伊斯蘭發展的整體環境條件，包括：1. 蘇聯時期的世俗化政策，包括政教分離與透過俄羅斯化過程試圖形塑一個新的共同體，即「the Soviets」(蘇維埃人)。2. 兩極世界體系下，在

1980 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以及蘇聯入侵阿富汗後間接造成 Taliban（塔利班）組織的建立。

關於蘇聯時期的宗教政策有兩個主要文件，一是 1917 年 11 月公告的「Deklaratsija prav narodov Rossii」（俄羅斯各民族權利宣言）⁶ 以及 1918 年 1 月發佈的「Ob otdelenie tserkvi ot gosudarstva i shkoly ot tserkvi」（政教分離令）。⁷ 「Deklaratsija prav narodov Rossii」是揭櫫後來蘇聯民族政策和國家體制規劃的一個重要文件，其中宣示各民族平等及主權性；各民族自由的自治權利，直到分離或是組成自主政府；取消一切民族及宗教的特權和限制；俄羅斯境內少數族群自由的發展。在這個宣言中的第三項「取消一切民族和宗教的特權與限制」，在 1918 年 1 月公告的「Ob otdelenie tserkvi ot gosudarstva i shkoly ot tserkvi」進一步的得到確認。

在「Ob otdelenie tserkvi ot gosudarstva i shkoly ot tserkvi」中明白揭示兩大原則：1. 教會分離於政府之外 (Tserkov' otdeljaetsja ot gosudarstva)，以及 2. 學校分離於教會之外 (Shkola otdeljaetsja ot tserkvi)。在第一個原則之下，政府不得以法律或命令，限制宗教自由，或使特定宗教信仰者享有優勢或特權。而在這個條件下，公民擁有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所有曾註記個人宗教信仰的文件都被註銷，政府的所有活動不得帶有宗教儀式和行為，宗教自由不得破壞社會秩序以及侵犯公民權利，也不可以藉宗教信仰逃避公民責任。而在第二個原則之下，禁止在公立和私立教育機構教授宗教信仰，個人只能以私人形式宣教。所有教會及宗教社團必須遵守關於私人組織的規範，不得接受任何補貼。任何教會及宗教社團不得擁有私產，教會及宗教社團不具有法人身分，教會及宗教社團的財產為人民所有。

由於前述的政治和宗教政策原則，自 1917 年革命之後，蘇聯系統透過各種方式限制伊斯蘭宗教活動的公開，試圖使其侷限在私人生活領域，將出現在公眾生活中的宗教活動以傳統文化視之，以淡化其宗教性。並且透過世俗政府建立的機關進行宗教活動的管理，也就是「Dukhovnoe Upravlenie Musul'man」（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的建立。

⁶ “Декларация прав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November 2 (15), 1917, <http://www.hist.msu.ru/ER/Etext/DEKRET/peoples.htm> (accessed September 10, 2016)

⁷ Декрет Совета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Об отделении церкви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школы от церкви”, February 2 (January 20), <http://istmat.info/node/28408> (accessed September 23, 2016)

穆斯林宗教管理局機制源自於凱薩琳二世 (Ekaterina II)⁸ 的「Ob uchrezhdenii Orenburgskogo magometanskogo dukhovnogo sobranija」(關於設立奧倫堡穆斯林會議) 上諭的建置，經歷帝國時代到 1943 年設立的「Dukhovnoe upravlenie Musul'man Srednej Azii i Kazakhstana」(中亞及哈薩克穆斯林宗教管理局)，一直運作到蘇聯解體後，「Dukhovnoe upravlenie Musul'man Srednej Azii i Kazakhstana」解散並獨立為各國的穆斯林管理局。⁹

蘇聯時期在中亞的共和國到 1950 年代以前，伊斯蘭基本上是處於地下活動的狀態，這是因為蘇維埃政權全力的打壓以及社會主義無神論意識形態宣傳的結果。明顯的事實是全中亞地區的清真寺自 1917 年布爾什維克革命 (Bolshevik revolution) 時期的 25000 座，到 1970 年代降到只有 500 座，其中烏茲別克只有 89 座。¹⁰

去宗教化加上「蘇維埃人」新國族的形塑，就形成蘇聯時期，中亞地區整體政治意識及社會型態的基本。「蘇維埃人」的概念在 1961 年 10 月蘇聯共黨第廿二次大會中由赫魯雪夫 (N. Khrushchev, 1894-1971) 藉著「消除民族差異性」(stiranie natsional'nykh razlichij) 以及「各民族結合」(slijanie natsij) 而第一次被正式提出來。這個「蘇維埃人」的概念具有下列幾個重要特徵：1. 是經濟生活的共同體（在同一個經濟領域內）、2. 社會階級的一致性（指工人、農人及知識勞動者在工人的領導地位下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份）、3. 政治生活的共同體（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為基礎而形成的多元民族文化）、4. 所有民族、種族的一致性（以社會國際主義而結合成的兄弟般聯盟，bratskij sojuz）、5. 蘇維埃生活的共同體（透過蘇聯建立之後所形成的傳統、習慣及價值）以及 6. 使用共同語言（俄羅斯語文成為各民族間的通用語文）。¹¹

⁸ 凱薩琳二世於 1789 年 9 月發佈「Ob uchrezhdenii Orenburgskogo magometanskogo dukhovnogo sobranija」(關於設立奧倫堡穆斯林會議) 的上諭，開啟國家對宗教社團及組織進行行政管理的歷史。

⁹ 管理局的運作是在蘇聯政府同意下，由各地登記有案的清真寺及宗教社團先行推選代表，組成大會。由大會選出 Mufti (最高職級宗教學者、大法官) 若干人組成主席團，行合議制，並由主席團中推選若干人為 Grand Mufti 的候選人，由蘇聯政府核定選出之。主席團成員任期為五年。例如，1948 年共 95 名代表，集聚塔什干 (Tashkent) 選出 11 名主席團成員及 3 名 Grand Mufti 候選人。中亞地區的 Grand Mufti 長時間由 Babakhany 家族擔任。Д. Ю. Арапов, “авт. предисл. и примеч.,” *Ислам и 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1944-1990),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Выпуск 3*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Марджани, 2011 год, сост.), 528 стр. с. 65.

¹⁰ Д. М. Иноятов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этнополитик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Вестник О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Выпуск № 1 (1), 2014 г., с. 55.

¹¹ М. I. Kulichenko,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развито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Москва: Мысл,

藉著 1960 年代赫魯雪夫解凍政策的出現，雖然對伊斯蘭宗教活動逐漸放寬，但是在布里茲涅夫 (L. Brezhnev, 1906-1982) 時期，蘇聯在政治，外交政策上由赫魯雪夫時期的放寬回到保守的態度，因此直到 1980 年代，伴隨著戈巴契夫 (M. Gorbachev, 1931-) 的改革與開放政策，中亞地區伊斯蘭活動才得以真正加速發展。也就是 1980 年代蘇聯的改革開放，促使原本封閉的蘇聯伊斯蘭社群與國際的伊斯蘭運動之間產生連接。

在蘇聯時期，長時間世界處於兩極世界的對抗狀態。在這種超過半世紀的對峙狀態下，偶爾在區域衝突中會出現宗教性色彩（例如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但是原則上政治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對峙很大程度在兩極對立的狀態下壓縮了宗教意識型態的活動。但由伊朗於 1979 年發生了推翻巴勒維政權的「伊斯蘭革命」，而觸發了第二波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等地出現了數以百計的公開的或秘密的伊斯蘭教政黨、派別和組織，一些原被取締的伊斯蘭政黨、組織也相繼恢復活動，這些非官方的宗教組織成為當今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鼓吹者、領導者和組織者。這種變革的出現，加上蘇聯在 1979 年入侵阿富汗導致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對抗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中，迅速在中亞地區傳播並且逐漸在蘇聯中亞的邊緣地區取得長時間的執政優勢（例如 Taliban 自 1996 年到 2001 年在阿富汗建立政權，並且一直在巴基斯坦北部盤據），在蘇聯解體後的變動局勢中造成重要的影響。

隨著 1985 年戈巴契夫改革開放腳步的加快，蘇聯在政治社會的變動性亦同時加劇，這其中包括了宗教活動的再度興起。例如，在 1987 年於莫斯科成立的「Vsesojuznaja Islamskaja Partija Vozrozhdenija」（全蘇伊斯蘭復興黨）即被視為是 70 年以來無神論意識形態下的一種反思。¹² Islamskaja Partija Vozrozhdenija Tadjikistana—IPVT（塔吉克斯坦伊斯蘭復興黨）則在 1990 年獲得合法政黨地位。其他以往被視為地下組織的宗教成員轉而得以在清真寺和宗教組織任職，類似像

1977), c. 29. 蘇維埃人的出現是根據史達林所謂「民族」具有四個特徵的說法進行建構。由此可以解釋「民族」本身是一恆動過程，而非靜態現象。蘇維埃人的出現，基本上是一個雙重的建構過程造成的結果，一方面是各民族在蘇聯國家所創造的條件下自然發生涵化過程，再加上蘇聯國家力量的催化，尤其 1941 年到 1945 年的對德戰爭後得到快速的發酵。

¹² “Программа Всесоюзной исламской партии возрождения”, http://old.iea.ras.ru/books/17_dag2/180620043402.htm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16)

Jamaat Tabligh（伊斯蘭宣道團）這樣的非政治性宗教組織自 1990 年後在中亞地區開始活躍。¹³

改革開放時期對蘇聯宗教政策最大的變動是伊斯蘭的積極份子打破了 Sredneaziatskoe Dukhovnoe Upravlenie Musul'man–SADUM（中亞伊斯蘭宗教管理局）的運作。1989 年 2 月 4 日烏茲別克及塔吉克教長們聚集在中亞伊斯蘭宗教管理局的巴拉克汗經學院（Madras Barak Khan），宣布召開中亞穆斯林緊急大會，指控巴巴汗諾夫（Grand Mufti Shamsiddin Babakhanov）出賣自己給不信神的世俗政權，要求立即將其撤換。當群眾聚集到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的總理府時，當時的第一書記卡里莫夫（Islam A. Karimov, 1938-2016）現身，同意群眾訴求並任命新的 Mufti。這次事件是世俗政權對於宗教的一大讓步——終結了蘇聯的宗教管理體系。1992 年中亞地區的穆斯林宗教管理系統開始重組，各國成立自己的宗教管理局並且受到當政者的嚴格控制。例如，土庫曼斯坦的地方 Mufti 都成為總統直轄的宗教事務部（Gengeshi Po Delam Religii）的中級官員。¹⁴

由前所述，中亞伊斯蘭活動在蘇聯時期，隨著國家在內外環境變遷的背景下，出現國家對社會控制力下降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外部因素的牽引下，導致所謂的中亞各國伊斯蘭復興運動。以下將藉由烏茲別克為主要案例，從政治面進行簡單討論。

肆、烏茲別克案例

伊斯蘭在中亞的發展變遷，若以烏茲別克作為案例，當可以探究出幾個軌跡：

1. 蘇聯解體與新國家的建立出現世俗國家與神聖國家的選擇問題。
2. 在共產主義被拋棄出現意識形態真空，並且一個由共產黨轉型所出現新興政權正當性的問題。
3. 與傳統社會文化結構相適應的衝突，包括傳統的父系氏族政治體系。事實上，此三個議題環環相扣，且具有直接的關聯性。在蘇聯瓦解二十多年後，回顧其歷程及

¹³ Jamaat Tabligh 直到 2006 年後才在中亞地區被禁止，包括 2006 年在塔吉克斯坦，2009 年在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而哈薩克斯坦要到 2013 年才禁止。

¹⁴ А. Мурслиев, “Духовный переворот в Ташкенте,”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09.07.1991.

影響，可得知一方面蘇聯的瓦解造就了新的世界格局；另外一方面卻也帶來長時間國際局勢的不可預測性與變動性。

蘇聯解體同時，中亞地區由於其文化傳統出現在其他加盟共和國沒有出現的一個問題，即新的獨立國家應該是個世俗國家還是個政教合一國家？換言之，是個政教分離的國家，還是個以伊斯蘭法為依歸的國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蘇聯還未正式解體前，烏茲別克費爾干那河谷地區 (Ferganskaja Dolina) 的伊斯蘭主義份子 (Islamist) 就已經有以伊斯蘭法作為建立國家依據的意識形態。1991 年 12 月在當地的那曼干市 (Namangan) 群眾，聚集要求烏茲別克應該要成為伊斯蘭國家。當時 Karimov 在大廳被迫面對高呼「Allahu Akbar」(真主至大) 的人群。¹⁵

在戈巴契夫改革開放的環境下，以及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出現政治動盪不安的情勢，各加盟共和國原來無神論的共產黨精英搖身一變成為民主政治與民族主義代言人。在這種戲劇化且諷刺的過程中新興獨立民主國家面臨了一個共同且無法迴避的事實，即兩極世界的消失以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崩潰。伊斯蘭成為中亞各國新領導人在這種情形下擁抱的對象。

伊斯蘭在這段時間之所以能扮演積極的社會與政治角色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是蘇聯瓦解前夕出現思想的真空；由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初，出現政治風暴，物資短缺。前景的不確定性使得一般人民在物質生活困頓之際，同時出現思想價值上的混亂；因此，傳統價值觀開始復甦。這不只是在伊斯蘭社群中有這種現象，在東正教教會也是。但是伊斯蘭的變動情形較基督宗教更大，而且這種現象普遍發生在俄羅斯境內的各共和國，包括車臣共和國，韃靼斯坦共和國以及中亞地區原加盟共和國。其次，在改革開放時期，所有的伊斯蘭運動被視為去共產黨民主化運動的一環。然而，一旦伊斯蘭運動進入政治權力的競逐就會出現本質上的改變，包括世俗政府的態度以及運動走向極端化與基本教義主義化。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因為伊斯蘭運動在進行所謂宗教復興與政治競逐時，並沒有一個類似政治性政黨的政治概念和綱領，所以大多是採取借鏡於境外經驗的途徑，在 1990 年代中，最典型的現象即

¹⁵ Фергана информгентство, “Ислам Каримов в Намангане в 1991 год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qf_8zGlrMg (accessed October 3, 2016); Абид Халид, *Ислам после коммунизма: Религия и политик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0), с. 199.

是瓦哈比主義 (Wahhabism) 的滲透進入。¹⁶

另一個重要的背景是，在蘇聯時期雖然形式上宗教活動受到限制，然而在社會文化結構中卻仍被保存下來。因此，當社會出現意識形態的思想中空現象時，回歸伊斯蘭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實。根據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ICG(國際危機組織)的調查，中亞地區百分之六十一的受訪者承認，宗教相當大程度影響了日常生活，並認為宗教只關乎涉及心靈層面。而百分之五十一的受訪者認為，政府的法制要能反映出宗教權利。¹⁷ 又如在對吉爾吉斯的研究中顯示，女性穆斯林回歸伊斯蘭信仰在蘇共解體後成為一種趨勢，尤其出現了以伊斯蘭信仰作為一種自我文化認同的途徑。¹⁸ 這些現象還包括在蘇聯瓦解的同時，各地區清真寺的增加，或類似 Islamskoe Dvizenie Uzbekistana-IDU (烏茲別克伊斯蘭解放運動)的出現，以及在塔吉克、車臣等地由伊斯蘭群體發動的武裝衝突。換言之，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的同時伊斯蘭復興就隨著出現。這種復興現象是中亞逐步性的伊斯蘭化 (Islamization) ——個人宗教意識的提升以及伊斯蘭宗教活動在公共領域的運作。¹⁹

既然烏茲別克國族 (nation) 在宗教、文化上皆為伊斯蘭信仰者 (Uzbekskij etnos javljaetsja islamskim po kul'ture i veroisповedeniju)，²⁰ 就新建立的政權而言，為了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以及在政治基礎上取得法理正當性 (legitimacy)，伊斯蘭就扮演了重要工具性的角色。誠如 Karimov 所言，伊斯蘭傳統主義者也當協助烏茲別克社會，將伊斯蘭文化與精神重建成為烏茲別克國族認同的依據基礎。²¹

¹⁶ М. Давлат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и исламские проекты,” in Материалы семинара, eds., *Динамика разви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в ЦА* (Душанбе: Ирфон, 2006), с. 26.

¹⁷ Джон Хизершо и Дэвид У. Монтгомери, “Миф о радикализации ислама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Программа “Россия-Евразия”*, Ноябрь 2014, с. 16,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field/field_document/20141111PostSovietRadicalizationRussian.pdf (accessed October 3, 2016)

¹⁸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Women and Radicalisation in Kyrgyzstan, Report No. 176”, September 3, 2009, p. i, 2,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176-women-and-radicalisation-in-kyrgyzstan.pdf>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¹⁹ Джон Хизершо и Дэвид У. Монтгомери, “Миф о радикализации ислама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с. 5.

²⁰ А. Х. Саидов, Я. С. Уманский и А. В. Арапов, “Светский путь в духе ислам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Узбекский этнос является исламским по культуре и вероисповедению*, Ташкент, 1995, <http://www.alexarapov.narod.ru/article202.htm> (accessed October 4, 2016)

²¹ И. А. Каримов, *Узбекистан на пороге XXI ве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Узбекистан, 1997), сс.135-136.

1980 年代末期烏茲別克開始宗教復興的過程中大致上產生一些現象：1. 認同自己是穆斯林的人數快速增加，超過 90% 的人在回答宗教屬性時回答穆斯林。2. 清真寺的數量由 1989 年的 300 座增加到 1993 年的 6000 座，到宗教學校 (Madrasah) 上課或聽講的人數增加。3. 類似古爾邦節 (‘Id al-Qurban)²² 宗教節慶成為國定節日。4. 伊斯蘭宣教的合法化以及擴大和國際上穆斯林國家的交流，參加國際性伊斯蘭組織。5. 穆斯林宗教組織及運動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成為反對勢力。²³ 前述的第五個現象成為世俗政權和伊斯蘭組織之間難以妥協的衝突，因為政治與宗教的基礎都是群眾，而這兩者在實務操作中是重疊的。換言之，政治和宗教之間是處於一種彼此競爭的狀態而非合作。

就烏茲別克的社會結構而言，在轉型過程中 Karimov 政權的基礎不是來自於伊斯蘭組織的認同，而是來自烏茲別克社會的氏族政治傳統。「氏族」作為一種非正規的組織包含由親屬聯連結構成的人際網絡，而這種親屬聯接並不一定是血緣形成，主要決定於個人對組織的認同與義務。這種義務包括下對上，以及彼此之間的承諾，並進而將菁英與非菁英連結在一起，從而製造出實質或虛構的親屬關係。這種「父系威權體制」現象在 1991 年後的中亞政治發展過程中成為一大特色。具有共同父系血緣關係的各氏族組織擴張之後形成的共同體，在跨越階級界線後，菁英利用氏族連接來達到自己在政治或經濟系統中的目的，其內部成員依賴集體的協助以獲得利益。

事實上，自 1920 年代後，蘇聯布爾什維克黨 (Bolshevik Party) 即開始嘗試消滅氏族系統。首先是用民族意識取代氏族意識（主要是透過政治劃分，確立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塔吉克人、土庫曼人、烏茲別克人等更高層次認同塑造）。其次，透過集體化方式，破壞傳統的農村氏族結構。但這兩種手段都沒有徹底打破傳統氏

²² [編按]Qurban 一詞可能源自於希伯來文，意謂「被獻祭者」或「犧牲獻祭」，曾出現於古蘭經文三次，但有不同的意涵；在 al-Hadith 也出現過，意指「殉教者之血」。在伊斯蘭兩大節慶中，‘Id al-Qurban 意指「‘Id al-Adha」(宰牲節)；台灣穆斯林傳統上又稱之為「忠孝節」，其意涵為亞伯拉罕 (Ibrahim) 的忠於真主阿拉 (Allah) 獻祭其子，其子伊實瑪儀勒 (Isma‘il) 也對父親孝順，答應被獻祭。而在阿拉伯基督宗教徒的用詞，則意旨「Feast of Corpus Christi」。

²³ “Ислам и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фактор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Медиа-холдинг Медина, June 16, 2011, <http://www.islamsng.com/uzb/dialogue/2011> (accessed October 7, 2016); J. Pottenger, “Civil Society, Religious Freedom and Islam Karimov, Uzbekistan’s Struggle for a Decent Society,”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3, No. 1, 2004, p. 67.

族結構。到布里茲涅夫時期，由於自傲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在「蘇維埃人」新共同體形成的前題下，氏族問題被蘇聯刻意忽視，使得中亞地區政治社會傳統運作的基本原則仍然保存下來。²⁴ 到安德洛波夫 (Yu. Andropov, 1914-1984) 及戈巴契夫時期在中亞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地方官員清洗，以俄羅斯人或俄羅斯化的中亞人取代原來的地方民族官員，導致部份地區重要的氏族集團的瓦解。如吉爾吉斯的「Usubaliev 氏族」以及烏茲別克的「Rashidi 氏族」都被排除在權力核心外。

這種作為雖然違反蘇聯在民族官員任命上的「在地化」(korenizatsija) 原則，但是究其目的則是在保證地方官員領袖向莫斯科效忠。吉爾吉斯的 Askar Akaev (1944-)、烏茲別克的 Karimov、哈薩克的 Nursultan Nazarbaev (1940-) 和土庫曼的 Saparmurat Atayevich Niyazov (1940-2006) 都是在這個背景下被莫斯科政權視為可以掌控的政黨官僚，因為沒有強大氏族作後盾，而能夠給予支持主政。但是，圍繞新掌權者的群體卻形成新氏族集團，取代原來的氏族建置。例如烏茲別克出現塔什干—撒馬爾干的競爭，吉爾吉斯回復南方的奧什 (Osh) 與北方比什凱克 (Bishkek) 的對應，哈薩克斯坦大玉茲 (Starshij Zhuz)、中玉茲 (Srednij Zhuz)、小玉茲 (Mladshij Zhuz) 的政治權力配置的現象。換言之，中亞地區所謂專制政權是建立在這些總統個人的氏族地域關係的脈絡上，所以其政權正當性並不穩定。²⁵ 這種權力正當性的不穩定所造成的競爭，將具有政治主張的伊斯蘭組織導向反對黨的立場，形成激烈的政治競爭。所以在 1997 年，烏茲別克政府禁止成立宗教背景的政黨，1998 年對全國的清真寺及宗教組織進行登記管理，並嚴格禁止 Khizbut Takhir al-Islami (伊斯蘭解放黨) 及 Islamskoe Dvizhenie Uzbekistana (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²⁶ 甚至

²⁴ K. Collins, "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 *World Politics*, Vol. 56, No. 2, 2004, p. 239.

²⁵ Р. С. Бобохонов, "Эволюция верховной власти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наука, научные кадры*, No. 2, 2012, сс. 182-192.

²⁶ 目前在塔吉克斯坦被禁止的宗教組織包括 Islamskoe dvizhenie Uzbekistana-IDU (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Khizbut Takhir al-Islami (伊斯蘭解放黨)、原教旨主義團體 (Salafiya) 以及 Jamaat Tabligh (伊斯蘭宣道會)。

參考："Запрещенные ислам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IslamNews.Tj, <http://islamnews.tj/banned.html> (accessed October 11, 2016)

在哈薩克斯坦明令禁止的則有：

1. 蓋達 (Аль-Каеда)
2.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Исламская пар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3. 庫德人民大會 (Курд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конгресс) ——庫德工人黨
4. 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到 1999 年 2 月 16 日，發生由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領袖 Dzuma Namangani 策動的暗殺 Karimov 事件，恐怖暴力成為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之間衝突的手段。²⁷

隨著 2001 年 911 事件的發生，中亞地區政治和宗教的衝突，正式與全球反恐行動產生連結。進入中亞地區代表基本教義主義的瓦哈比主義與原教旨主義 (Salafism) 成為與本土宗教政黨與組織共同被打擊的對象。²⁸ 延續政治的壓力，在社會文化面上清理原教旨主義的影響以確保俗世國家權力與在社會的權威性，成為烏茲別克政府的重要工作。例如，2014 年、2016 年「烏茲別克穆斯林管理局」(Dukhovnoe upravlenie musul'man Uzbekistana – DUMU) 建議在齋戒月 (Ramadan) 期間入夜後，禁止群眾在清真寺及其他公共場所聚集活動。自 2015 年起，17 歲以下年輕人禁止封齋、開齋 (另有資料顯示為 18 歲以下)，²⁹ 2015 年對特定穿著婦

-
5. Asbat al-Ansar (Асбат-аль-Ансар) —— 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又稱游擊隊同盟 (Лига патризан)
 6. 穆斯林兄弟會 (Братья мусульмане)
 7. 塔利班 (Талибан)
 8. 灰狼 (Боз Гурд) —— 土耳其右翼極端組織
 9. 中亞伊斯蘭聖戰組織 (Жамаат моджахед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0. 神之軍 (Лашкар-и-Тайба) —— 活躍在印巴喀什米爾地區的順尼派武裝集團
 11. 社會改革 (Джамият аль-Ислах аль-Иджтимаи-Обще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ых реформ)
 12. 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13. 奧姆真理教 (АУМ Синрике)
 14. 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Исламская партия Туркестана)
 15. 哈里發戰士 (Джунд-аль-Халифат)
 16. 伊斯蘭國 (Ислам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17. 努斯拉陣線 (Фронт ан-Нусра)

參考：「哈薩克斯坦總檢察署法律統計委員會」(Komitet po pravovoj statistike i spetsial'nym uchetam general'noj prokuratury Respubliki Kazakhstana) 公告的「恐怖組織名單」(Spisok terroristicheskikh organizatsij)：“Список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Комитет по правовой статистике и специальным учетам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а，

<http://pravstat.prokuror.kz/rus/o-kpsisu/spisok-terroristicheskikh-organizaciy> (accessed October 11, 2016)

²⁷ “Попытка покушения н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слама Каримова”，Первый канал, February 16, 1999, https://www.1tv.ru/news/1999/02/16/297841-popytka_pokusheniya_na_prezidenta_uzbekistana_islama_karimova (accessed October 19, 2016)

²⁸ 中亞解體後，積極進入中亞的除了原教旨主義外，還有其他伊斯蘭活動團體。著名的有 Gülen 運動 (又稱「Hizmet 運動」)。早期 Gülen 運動的目標在使中亞重拾伊斯蘭的自我意識，強調新式教育及宗教間對話的必要性，其最終目的是要在當地國家，透過菁英的養成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目前在哈薩克斯坦有 30 間學院，1 間大學。吉爾吉斯有 10 間學院，1 間大學。塔吉克有 10 間。烏茲別克在 2000 年時禁止 Gülen 運動。而土庫曼原有的 12 間學院，則在 2011 年大部分被收歸國有，留下一間學院 (Торгут Озал) 及土庫曼—土耳其大學。Даниил Кислов, “Саид Нурси и Фетхуллах Гюлен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лияние на религию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Ферган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January 22, 2013,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s/7598> (accessed October 29, 2016)

²⁹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запрет на Ифтары и Травихи, в Китае запрет на Уразу”, UMMA-42, June 7, 2016, <http://www.umma-42.ru/news-61696.html> (accessed November 1, 2016)

女進行口卡登記。³⁰

這些在某種觀點上會被視為有害宗教自由的舉措，³¹ 而且都是出自於對宗教組織極端化的反應。因為已經證實在伊斯蘭國 (ISIS) 有來自烏茲別克、哈薩克、土庫曼和吉爾吉斯的成員。³² 這些成員據估計，到 2016 年夏天，粗估參加人數以哈薩克最多到 100 人，吉爾吉斯人為 500-800 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塔吉克人合計近 1000 人。³³ 基於此，必須考慮宗教組織在本土受到外來意識形態影響而出現極端化的因素。

伍、宗教極端化的變因

二十世紀，很多社會學家認為，隨著現代化和世俗化的腳步，宗教在社會運作中的影響力會逐步減弱。³⁴ 但是就中亞的實際情況來看，特別是極端化的出現顯示事實似乎並非如此。一般認為，威權主義和貧窮的結合帶來極端化的結果。³⁵ 這個

³⁰ “В Ташкенте составляют списки женщин, не следующих правилам ношения одежды”, Озодлик, December 1, 2015, <http://www.ozodlik.org/a/27399564.html> (accessed November 2, 2016)

³¹ “Ситуация со свободой вероисповедания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Ферган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November 23, 2010,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807> (accessed November 1, 2016)

³² Виталий Волков, “Боевик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оевавшие в рядах ИГ и Сирии,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на родину, - эксперты”,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ая новостная служба, <http://ca-news.org/news:1126953>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6)

³³ “Боевик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ассово покидают ряды ИГ”, Независимая, July 7, 2016, <http://www.ng.ru/news/547978.html> (accessed November 22, 2016)

此外，哈薩克自 2016 年起，禁止學生在學校穿著名為 *parandja* 及 *niqab* 兩種全罩式黑色頭巾。哈薩克教育部稱「Dukhovnoe Upravlenie Musul'man Kazakhstana」(哈薩克穆斯林管理局) 支持此政策，並稱：穿戴這兩種頭巾「並非我們及我們祖先的傳統」(ne nasha tranitsija i ne traditsija nashikh predkov)。Кайрат Матреков, “Управление мусульман согласилось с запретом хиджаба в школах (Обзор казпрессы)”, 365 Info, March 17, 2016, <https://365info.kz/2016/03/upravlenie-musulman-soglasilos-s-zapretom-hidzhaba-v-shkolah-obzor-kazipressy/> (accessed May 4, 2017)

³⁴ Peter L.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7), pp. 26-28; Peter L. Berger, ed.,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Grand Rapids, Mich.: W. B. Eerdmans Pub. Co., 1999), pp. 1-18; Steve Bruce,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Unnecessary Recantation: Berger and Secularization,” in Paul Heelas, David Martin and Linda Woodhead, eds., *Peter Berger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87-100.

³⁵ V. Zhavoronkova, “Experts: Poor Political Systems in Central Asia May Lead to Extremism”, *Trend News*, February 18, 2010, <https://en.trend.az/azerbaijan/politics/1641159.html>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觀點廣泛地在調查中被突顯。例如，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ICG 在 2009-2013 年的調查中也呈現出同樣的結論。在該組織 2009 年的報告「中亞：腐化與衰微」(Central Asia: Decay and Decline) 中，指名當時中亞各國政府必須注意的危險現象有：1. 貧窮、不穩定、激進和國家崩潰的可能性以及國家基本服務功能的喪失，³⁶ 2. 惡劣的居住條件、貪汙、權力濫用，³⁷ 3. 經濟危機以及操縱選舉，³⁸ 4. 勞動力需求的降低，³⁹ 5. 悲觀的社會和經濟環境，⁴⁰ 6. 自私自利的政治菁英。另外，ICG 在 2013 年對哈薩克的調查中指出，經歷 2011 年在哈薩克發生的恐怖攻擊，哈薩克的專家及政界一致認為宗教極端主義散布的主要原因在於地方惡劣的社會經濟環境。⁴¹ 這種將極端化產生的原因歸咎於社會經濟條件的惡劣，幾乎是所有關於這類研究的結論。另一個問題在威權主義的專制性，亦即，政治上的打壓造成宗教組織的極端化。吉爾吉斯共和國第五屆國會 (Zhogorku Kenesh) 議員 Kanybek Osmonaliev (1953-) 以吉爾吉斯境內的 Khiz uy-Takhrir (解放黨) 的政治歷程為例，支持這種觀點。⁴²

雖然前述的假設符合我們對於極端主義和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之間關連性的一般理解，但是，如果由其他途徑去分析，卻有可能出現另一種答案。我們先由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來觀察。透過世界銀行的資料庫，可以得到中亞各國歷年基尼係數的數據如下：

	哈薩克	吉爾吉斯	土庫曼	塔吉克	烏茲別克
--	-----	------	-----	-----	------

³⁶ ICG, “Central Asia: Decay and Decline, Report No. 201”, February 3, 2011, p. 36,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201-central-asia-decay-and-decline.pdf>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³⁷ ICG, “Central Asia: Islamists in Prison”, December 15, 2009, p. 13,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b97-central-asia-islamists-in-prison.pdf>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³⁸ ICG, “Women and Radicalisation in Kyrgyzstan Report No. 176”, p. ii.

³⁹ ICG, “Central Asia: Migrants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Report No. 183”, January 5, 2010, p.14,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183-central-asia-migrants-and-the-economic-crisis.pdf>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⁴⁰ ICG, “Central Asia: Islamists in Prison”, p. 1.

⁴¹ ICG, “Kazakhstan: Waiting for Change, Report No. 250”, September 30, 2013, p. 19,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kazakhstan-waiting-for-change.pdf>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⁴² Махинур Ниязова, “Каныбек Осмоналиев: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религия для силовых структур - только повод оправдать свои действи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24.kg, January 19, 2011,

<https://24.kg/archive/ru/community/90951-kanybek-osmonaliev-v-kyrgyzstane-religiya-dlya.html/> (accessed January 11, 2017)

2000	X	31.0	X	X	36.1
2001	35.3	30.2	X	X	X
2002	34.1	30.3	X	X	33
2003	33.2	28.7	X	32.7	35.3
2004	31.5	34.8	X	33.6	X
2005	29.7	38.3	X	X	X
2006	30.0	38.4	X	X	X
2007	28.5	33.4	X	32.2	X
2008	29.1	32.1	X	X	X
2009	28.8	29.8	X	30.8	X
2010	28.6	29.9	X	X	X
2011	27.4	27.8	X	X	X
2012	27.4	27.4	X	X	X
2013	26.4	X	X	X	X
2014	X	X	X	X	X
2015	X	X	X	X	X

【表 1】中亞五國基尼係數指標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accessed November 30, 2016)。

由上述資料來看，如果以最小數字和最高數字區分，哈薩克歷年基尼係數落在 26.4-35.3，而且呈下降趨勢。吉爾吉斯是 27.4-38.4，自 2006 年起也是呈下降趨勢。其餘土庫曼，塔吉克，烏茲別克三國數據都不完整。但是以現有數字來看，這些國家的指數大都落在級數的「低」或「中」。

再者，我們透過「自由之家」對各國自由度的評估資料來觀察一個國家的專制性程度，可以得到下列的數據：

	哈薩克	吉爾吉斯	土庫曼	塔吉克	烏茲別克
2000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01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02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03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04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05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06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07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08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09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10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11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12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13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14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2015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表 2】中亞五國自由度評比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歷年資料，<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types/freedom-world> (accessed November 30, 2016)。

接著我們再利用新聞資料，把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歷年的曾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做一個整理如下：

時間	地點	時間	地點
2011/05/17	阿克秋貝 (Ақтөбе)	2012/08/13-14	阿拉木圖
2011/07/01	阿克秋貝	2012/09/05	阿提勞

2011/11/31	阿提勞 (Атырау)	2012/09/12	阿提勞
2011/11/21	塔拉斯 (江柏爾斯) (Тараз [Жамбылс])	2012/09/15	阿提勞
2011/12/03	阿拉木圖 (Алматы)	2012/09/20	阿提勞
2016/06/05	阿克秋貝	2016/07/18	阿拉木圖

【表 3】哈薩克斯坦近年恐怖攻擊事件表

資料來源：“Теракт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Хроника пяти лет”, Open Asia, June 6, 2016, <http://theopenasia.net/articles/detail/terakty-v-kazakhstane-khronika-pyati-let/>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7)。

時間	地點	時間	地點
1999/02/16	塔什干 (Ташкент)	2004/04/01	布哈拉
1999/08/06	巴特肯 (Баткен) ⁴³	2004/07/30	塔什干
2004/03/29	塔什干/布哈拉 (Бухара)	2005/05/12-13	安集延 (Анжижан)
2004/03/30	塔什干	2009/05/26	哈那巴德 (Ханабад)
2004/03/31	塔什干		

【表 4】烏茲別克近年恐怖攻擊事件表

資料來源：“Теракты и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в 1999-2005 гг. Справка”, RIA, May 26, 2009, <https://ria.ru/world/20090526/172345801.html>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7)。

時間	地點	時間	地點
2000/01	杜尚貝 (Душанбе)	2009/07/30	杜尚貝
2000/02	杜尚貝	2010/09/03	霍譚 (Худжанд)
2005/01/31	杜尚貝	2012/07/4	河洛戈 (巴達克山) (Хорог [Бадакшан])
		2015/09/04	巴赫達特 (Бахдат)

【表 5】塔吉克斯坦近年恐怖攻擊事件表

資料來源：“Атака боевиков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NTV, <http://www.ntv.ru/sobytie/Атака боевиков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7)。

⁴³ 該事件為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在吉爾吉斯境內發動，故列入烏茲別克統計資料內。

時間	地點	時間	地點
2002/12/27	比什凱克 (Бишкек)	2015/10/25	比什凱克
2003/05/08	奧什 (Ош)	2015/12/11	比什凱克
2010/11/30	比什凱克	2016/08/30	比什凱克
2015/07/16	比什凱克		

【表 6】吉爾吉斯斯坦近年恐怖攻擊事件表

資料來源：“От каких терактов содрогался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следние 15 лет”, August 30, 2016, <https://ru.sputnik.kg/Kyrgyzstan/20160830/1028868583.html>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7)。

由前述兩個資料進行比對，大約可以發現幾個問題，雖然貧窮與專制威權性的因素在很多討論中被提及，並得到廣泛的支持和同意，但是卻有下列需要再考慮的地方。首先，就貧窮項目來看。以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指標觀察，五個國家的情形差別不大。但是矛盾在於，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正好是中亞各國中處在富裕和貧困兩端的國家，因此貧窮，貧富不均的條件似乎無法完全說明前述的論點。而由自由度的指標來觀察，吉爾吉斯大部分時間是屬於部分自由，也就是說，吉爾吉斯較其他國家顯得相對開放的同時，並沒有保證極端化造成的恐怖攻擊頻率是下降。尤其吉爾吉斯在恐怖攻擊較頻繁的時候，都是處於自由度較好的時間。由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土庫曼斯坦是強人政權統治，而且是傳承兩代，卻沒有極端的武裝組織現象。而由另一個國家烏茲別克的情形來看，在這個強人統治的國家，大多數的宗教組織被打壓或是驅逐之後，烏茲別克就未出現恐怖攻擊事件。在塔吉克斯坦的武裝宗教組織，則是在 1990 年代內戰逐漸停止之後隨之減弱了影響力，武裝攻擊零星出現。

由前述的概略分析可以發現，中亞地區極端組織的武裝活動發生頻率和地區的政治穩定與否成反比關係（在此先不考慮塑造政治穩定的原因有哪些，或是造成政治穩定手段的道德與否）。亦即，當政治穩定強時，武裝活動頻率下降，當政治穩定低時，武裝活動發生頻率高。在土庫曼甚至沒有極端組織武裝活動的紀錄，因此，極端化宗教武裝組織的活動似乎和政治的穩定性與否有較強烈的關聯。也就是說，雖然我們不能排除貧窮或是威權體制是引發恐怖攻擊的重要影響因素，但是維持政治環境的穩定性，是降低恐怖攻擊頻率的必要條件之一，與建構公平發展社會的條

件同樣重要。

陸、結語：政治與伊斯蘭互動角色的階段性變動

蘇聯在 1920 年代的國家建構過程中，中亞地區的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五個加盟共和國正是以伊斯蘭為傳統宗教信仰的地區。但是由於蘇聯的建立，這五個國家被納入現代國家體制中，進入現代化。又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無神論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宗教信仰，在在與其傳統產生矛盾。與此同時，五個國家所處的邊緣位置又正是 1980 年代起，周邊國家伊斯蘭復興運動浪潮的接觸地帶，這些因素使得中亞國家自 1990 年代起身處現代化與傳統化兩股風潮的交錯之中。我們可以把後蘇時期伊斯蘭運動的政治化過程分成下列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去共黨化的民主化階段。這時伊斯蘭運動視為民主力量之一，新當權的政府透過伊斯蘭的推廣，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以及強化政權的正當性。


第二個階段：政治競爭階段，伊斯蘭政黨與運動成為世俗政權的競爭者，兩者之間產生激烈的衝突。世俗政權利用政治與武裝壓力壓迫宗教組織停止活動，轉入地下或是離開國內。

第三個階段：隨著基本教義主義的擴張滲透到，原本以蘇非主義 (Sufism) 或是復興主義 (Jadidism) 的中亞地區，進而出現外部的力量介入到本土的政治和社會情境，形成一種內部的競逐。換言之，目前中亞地區伊斯蘭所處的一個巨大變動的時期，一個本土伊斯蘭與外來伊斯蘭的話語權競爭階段。這種話語權的競爭，包括了對宗教本質的理解，宗教是文化整體結構的一部分抑或宗教即是文化的全體？個人在這個系統中如何保有個人的自我性？

對宗教變遷過程中多元性變化所產生的的認知是，宗教的表現是否必須遵循一定的傳統範式，還是宗教本身在其變遷過程中，所出現的多元化才是宗教的真實風貌？而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政治與宗教之間互動關聯性價值的取捨有不同的現

象。就人類文明政治史的發展歷程來觀察，政治與宗教之間在面對同樣的群眾基礎時，兩者之間究竟應該處於哪種相對應位置？是彼此平行而立，還是容許政治將宗教納入國家的體制結構之中，成為國家機制的部門之一？或是將所謂的國家視為神聖國度架構的實踐場域？由中亞地區的例子來看，這不是伊斯蘭單一宗教的問題，而是任一宗教在反思與政治互動過程中都需面對的質疑。以西方政治史的脈絡比對，今天中亞伊斯蘭和政治之間的競合關係，似乎是所有宗教在其變遷過程中都需經過的歷程。

由前述的角度出發，面對貧窮，威權專制並追求政治穩定性的前提下，最終還是回到長久以來的一個問題——現代化的意義。從另一個觀點來看，現代化與傳統之間是否是處於一種相互替代的矛盾關係，還是相互蛻變的相依關係？這種爭論時常造成我們在面對宗教問題時，把科學事實和價值實踐相互影響而難以得到平衡。回顧歷史，中亞地區自公元七世紀由於阿拉伯人的征服傳入伊斯蘭後，出現與當地本土政權和原有信仰的競爭，至十一世紀在花刺子模確立了哈那斐法學派 (al-Hanafiyyah) 其在中亞地區的地位，促使中亞成為蘇非主義重要的傳播地區，並進而影響到中國新疆及西北地區。直到十九世紀末，由於工業化和貿易發展，中亞地區受現代化思潮衝擊，促使具有強烈改革色彩的復興主義 在中亞地區生根茁壯。

在宗教的傳播同時，併隨著不同政權的更替，在十九世紀因為俄羅斯帝國的征服，中亞地區在政治上被納入單一國家體系。隨後在無神論為本質的蘇聯架構下，出現去政治化與世俗化的工程，直到 1990 年代。透過簡短的歷史回顧中可以理解，中亞地區的伊斯蘭雖然在同一的伊斯蘭整體框架之中，但是其歷史演變所形成的中亞伊斯蘭風貌具有濃烈的自我特色，與伊斯蘭的原生性質構成明顯的差異。這種特色與差異反映出，伊斯蘭作為一個有機生命體，在時間與空間構成的內外環境交互影響下所生成的變革，而這種自我的變革正是伊斯蘭文明發展中的重要元素。

徵引書目

一、文件、報告

(一) 俄文

“Декларация прав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Deklaratsija prav narodov Rossii)”, November 2 (15), 1917, <http://www.hist.msu.ru/ER/Etext/DEKRET/peoples.htm> (accessed September 10, 2016)

Декрет Совета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Об отделении церкви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школы от церкви (Ob otdelenie tserkvi ot gosudarstva i shkoly ot tserkvi.)”, February 2 (January 20), 1918, <http://istmat.info/node/28408> (accessed September 23, 2016)

(二) 英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Central Asia: Decay and Decline, Report No. 201”, February 3, 2011,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201-central-asia-decay-and-decline.pdf>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Central Asia: Islamists in Prison”, December 15 2009,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b97-central-asia-islamists-in-prison.pdf>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Central Asia: Migrants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Report No. 183”, January 5, 2010,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183-central-asia-migrants-and-the-economic-crisis.pdf>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Kazakhstan: Waiting for Change, Report No. 250”, September 30, 2013,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kazakhstan-waiting-for-change.pdf>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Women and Radicalisation in Kyrgyzstan, Report No. 176”, September 3, 2009,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176-women-and-radicalisation-in-kyrgyzstan.pdf>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二、專書

(一) 俄文

Kulichenko, M. I.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развито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Natsional'nye otnosheniya v razvitom sotsialisticheskom obshchestve)*.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77.

Арапов, Д. Ю. “авт. предисл. и примеч.” *Ислам и 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1944-1990),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Выпуск 3 (Islam I sovetskoe gosudarstvo (1944-1992), Sbornik dokumentov, Vypusk 3)*.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Марджани, 2011 год, сост., 528 стр.

Каримов, И. А. *Узбекистан на пороге XXI века (Uzbekistan na poroge XXI veka)*.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Узбекистан, 1997.

Халид, Абид. *Ислам после коммунизма: Религия и политик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Islam posle kommunizma: Religija i politika v Tsentral'noj Azii)*. Москва: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0.

(二) 英文

Alexander, Jeffrey C. “lect. 8. Conflict theory (1) John Rex’s strategy,” “lect. 9. Conflict theory (2) Rex and the problem of coercion,”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7-155.

Barnard, Ala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erger, Peter L. ed.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Grand Rapids, Mich.: W.B. Eerdmans Pub. Co., 1999.

Berger, Peter L.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7.

三、期刊論文

(一) 俄文

Бобохонов, Р. С. “Эволюция верховной власти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Evoljutsija verkhovnoj vlasti v Tadjhikistane),”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наука, научные кадры*, No. 2, 2012, сс.182-192.

Иноятова, Д. 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этнополитик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Узбекистане (Stonovlenie i razvitie etnopolitiki v sovremenном Uzbekistane),” *Вестник О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Выпуск № 1 (1), 2014 г.

(二) 英文

Collins, K. “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 *World Politics*, Vol. 56, No. 2, 2004, pp. 224-261.

Pottenger, J. “Civil Society, Religious Freedom and Islam Karimov: Uzbekistan’s Struggle for a Decent Society,”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3, No. 1, 2004, pp. 55-77.

四、專書論文

(一) 俄文

Давлатов, 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и исламские проекты,” in Материалы семинара eds. *Динамика разви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в ЦА* (Душанбе: Ирфон, 2006), сс.26-28.

(二) 英文

Banuazizi, Ali. “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Huntington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p. 281-316.

Bruce, Steve.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Unnecessary Recantation: Berger and Secularization,” in Paul Heelas, David Martin and Linda Woodhead eds. *Peter Berger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87-100.

五、其他

(一) 俄文

“Атака боевиков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Ataka boevikov v Tadjhikistane)”, NTV, <http://www.ntv.ru/sobytie/Атака боевиков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7)

“Боевик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ассово покидают ряды ИГ (Boviki iz Tsentral'noj Azii massovo pokidajut rjady IG)”, Независимая, July 7, 2016, <http://www.ng.ru/news/547978.html>

(accessed December 9, 2016)

- “В Ташкенте составляют списки женщин, не следующих правилам ношения одежды (V Tashkente sostavljajut spiski zheshchin, ne sledujushchikh pravilam noshenija odezhdy)”, Озодлик, December 1, 2015, <http://www.ozodlik.org/a/27399564.html> (accessed November 2, 2016)
-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запрет на Ифтары и Травихи, в Китае запрет на Уразу (V Uzbekistane zapret na Ifтары i Travikhi, v Kitae zapret na Urazu)”, UMMA-42, June 7, 2016, <http://www.umma-42.ru/news-61696.html> (accessed December 19, 2016)
- “Запрещенные ислам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Zapreshchenye islamskie organizatsii)”, IslamNews.Tj, <http://islamnews.tj/banned.html> (accessed October 11, 2016)
- “Ислам и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фактор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Узбекистане (Islam i religioznyj faktor v sovremennom Uzbekistane)”, Медиа-холдинг Медина, June 16, 2011, <http://www.islamsng.com/uzb/dialogue/2101> (accessed October 7, 2016)
- “От каких терактов содрогался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следние 15 лет (Ot kakikh teraktov sodrogalsja Kyrgyzstan poslednie 15 let)”, Sputnik, August 30, 2016, <https://ru.sputnik.kg/Kyrgyzstan/20160830/1028868583.html>.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7)
- “Попытка покушения н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слама Каримова (Popyтка pokusheniya na ptrzidenta Uzbekistana Islama Karimova)”, Первый канал, February 16, 1999, https://www.1tv.ru/news/1999/02/16/297841-popyтка_pokusheniya_na_prezidenta_uzbekistana_islama_karimova. (accessed October 19, 2016)
- “Программа Всесоюзной исламской партии возрождения (Programma Vsesojuznoj islamskoj partii vozrozhdenija)”, http://old.iea.ras.ru/books/17_dag2/180620043402.htm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16)
- “Ситуация со свободой вероисповедания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Situatsija so svobodoj veroispovedeniya v Uzbekistane)”, Ферган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November 23, 2010,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807> (accessed November 1, 2016)
- “Список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Spisok terroristicheskikh organizatsij)”, Комитет по правовой статистике и специальным учетам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а, <http://pravstat.prokuror.kz/rus/o-kpsisu/spisok-terroristicheskikh-organizacij> (accessed October 11, 2016)

“Теракт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Хроника пяти лет (Terakty v Kazakhstane Khronika pjati let)”, Open Asia, June 6, 2016, <http://theopenasia.net/articles/detail/terakty-v-kazakhstane-khronika-pyati-let/>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7)

“Теракты и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в 1999-2005 гг. Справка (Terakty i besporjadki v Uzbekistane v 1999-2005 gg. Spravka)”, RIA, May 26, 2009, <https://ria.ru/world/20090526/172345801.html>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7)

Волков, Виталий. “Боевик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оевавшие в рядах ИГ и Сирии,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на родину, - эксперты (Bieviki iz Tsentral'noj Azii, vovavshie v rjadakh IG i Sirii, vozvrashchajutsja na rodinu)”,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ая новостная служба, <http://ca-news.org/news:1126953> (accessed November 22, 2016)

Кислов, Даниил. “Саид Нурси и Фетхуллах Гюлен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лияние на религию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Said Nursi i Fetkhullakh Gjulen v Tsentral'noj Azii: Vlijanie na nreligiju i obrazovanie posle raspada SSSR)”, Ферган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January 22, 2013,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s/7598> (accessed October 29, 2016)

Матреков, Кайрат. “Управление мусульман согласилось с запретом хиджаба в школах (Обзор казпрессы) (Upravlenie musul'man soglasilos' s zapretom khidzhaba v shkolakh (Obzor kazpressy))”, 365 Info, March 17, 2016, <https://365info.kz/2016/03/upravlenie-musulman-soglasilos-s-zapretom-hidzhaba-v-shkolah-obzor-kazpressy/> (accessed May 4, 2017)

Мурслиев, А. “Духовный переворот в Ташкенте (Dukhovnyj perevorot v Tashkente)”,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July 9, 1991.

Ниязова, Махинур. “Каныбек Осмоналиев: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религия для силовых структур - только повод оправдать свои действия” (Kanybek Osmonaliev: “V Kyrgyzstane religija dlja silovykh struktur-tol'ko povod opravdat' svoi dejstvija”)”,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24.kg, January 19, 2011, <https://24.kg/archive/ru/community/90951-kanybek-osmonaliev-v-kyrgyzstane-religiya-dlya.html/> (accessed January 11, 2017)

Саидов, А. Х., Уманский, Я. С. и Арапов, А. В. “Светский путь в духе ислам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азмышления (Svetskij put' v dukhe islamskoj kul'tury: razmyshlenija)”, *Узбекский этнос является исламским по культуре и вероисповедению*, Ташкент, 1995, <http://www.alexarapov.narod.ru/article202.htm> (accessed October 4, 2016)

Фергана информагентство. “Ислам Каримов в Намангане в 1991 году (Islam Karimov v Namangane v 1991 go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qf_8zGIrMg (accessed October 3, 2016)

Хизершо, Джон и Монтгомери, Дэвид У. “Миф о радикализации ислама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Mif o radikalizatsii islama v respublikakh Srednej Azii v postsovetskij period)", *Программа «Россия-Евразия»*, Ноябрь 201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field/field_document/20141111PostSovietRadicalizationRussian.pdf (accessed October 3, 2016)

(二) 英文

Freedom House,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types/freedom—world> (accessed November 30, 2016)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accessed November 30, 2016)

Zhavoronkova, V. "Experts: Poor Political Systems in Central Asia May Lead to Extremism", *Trend News*, February 18, 2010, <https://en.trend.az/azerbaijan/politics/1641159.html>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6)

(責任編輯：余承叡)